

试论清末民初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以英语诗歌汉译为例

谷莹莹

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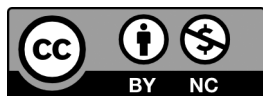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要 |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与语言、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民初时期内忧外患的国情推动中国翻译活动迎来了又一次高潮。清末民初英语诗歌汉译，将自由诗引入中国诗歌，丰富了诗歌形式，重复、感叹号的使用让中国诗歌情绪的彰显更直接，还扩充了诗歌内容、题材，推动了诗歌流派的多样化。

关键词 |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语言；文化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勒菲弗尔指出，文学翻译不是两种语言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Lefevere, 2006: 6）。“现在翻译界基本达成了如下的共识：就其具体操作层面而言，翻译是语言转换活动，而就其本质而言，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许钧，2002: 223）。纵观中西翻译史，我们会发现，正是人们对文化进步的渴望催生了对翻译的需求。有了翻译的推动，各个文明意识形态、民族语言的发展都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和养分，而文化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翻译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深入。

目前，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翻译题材的研究（赵昱辉，2021；董雨晨，2020；王琳，2020）、翻译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韦

骅，2013）、与其他时期翻译活动的对比（郭亚文，张政，2017；柴清华，2014），而对该时期翻译活动对中国语言文化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以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为切入点，回顾了清末民初文化翻译的时代背景和诗歌翻译，进而分析诗歌翻译活动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诗歌发展的深刻影响。

二、清末民初文化翻译

“清末民初的历史断代有多重认定，通常近代在政治史上的概念指的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840—1919）这近80年的历史”（高梦涵，2020: 2）。本文笔者研究该时期的诗歌翻译及其对中国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部分内容涉及1920年以后的诗歌翻译及作品。

（一）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赵冰、孙雪松，2015：46）。翻译离不开时代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封建腐败统治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对西方世界所知甚少。随着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旧中国的大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处在封建统治之下的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危机日益加深，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

“而清末戊戌变法的失败，更使得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中学为体’不再抱有希望，纷纷开始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希冀让文化和文学的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谢天振，2009：149）。20世纪初，在翻译的推动下，国外政治、经济和文化涌入中国、开启民智，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未来的出路及可能，一场提倡民主科学、推崇个性解放、猛烈抨击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让西方先进思想传播给更多阶层的人民。

（二）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社会各界革新、冲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枷锁。为了寻找新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对西方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译介。西方诗歌以自由民主、清新瑰丽的风格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诗歌中涉及的自由民主、爱国救亡、爱情等题材，既启发民智、推动人民冲破传统礼教的约束，又开拓了诗歌题材的广度。

胡适认为中国诗歌的革新需要通过翻译来推动，他翻译了《六百男儿行》《缝衣歌》《哀希腊》《老洛伯》《关不住了》等英文诗歌，题材覆盖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生活、爱国救亡的呼唤和对爱情的呼唤，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其中部分诗歌作为白话诗的初探虽没有摆脱旧体诗的痕迹和枷锁，但其敢于开拓创造的勇气使该诗集成为白话诗发展上不可忽视的一座里程碑。

郭沫若在日留学期间，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这使他能大量接触和阅读许多西方名家的诗歌并受其直接影响。他着手翻译了泰戈尔、海涅、雪莱、

惠特曼等人的诗歌，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偶成》《云鸟曲》。翻译初期，泰戈尔清新自然的诗风和散文式的诗歌形式打动并影响了郭沫若，他由此写下《新月与白云》《晚步》《死的诱惑》等诗。后来，他接触到惠特曼的诗歌，被其生机勃勃的诗风和“自我本位”的创作思想所打动。

“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慷慨激昂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谭福民，2013：110）。他创作的《天狗》《匪徒颂》等诗歌都可窥见民主自由、宣扬自我精神的痕迹。徐志摩译介了哈代、华兹华斯、拜伦、泰戈尔的诗歌，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朦胧诗，以新奇的风格、巧妙的韵律和优美的意境见长。与徐志摩同为新月派诗人的闻一多翻译了《沙漠里的星光》及《十四行诗》等诗。

这些诗人在翻译西方诗歌的同时，吸收和接纳了新的诗歌形式、语言风格和诗歌题材，将之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丰富了白话文诗歌的内容、题材和形式。可以说，诗歌翻译为中国白话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三、清末民初诗歌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将西方各个领域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诗歌翻译在诗歌形式的转变、情绪的彰显及内容、流派及题材的多样化这三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

（一）诗歌形式的转变

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推动了古体诗向现代诗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诗歌形式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的热潮带动了白话新诗运动。胡适曾说过“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胡适，1998：134）。国内严峻的形势、白话文的兴起和内容表达的需求，推动了西诗中译形式的转变。

在翻译外国诗歌初期，中国的译诗者们大多选用中国近体诗或骚体、曲牌的形式，这是由于当时大多知识分子译诗的目标读者，都是受过教育者，且这些诗歌形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他们

乐于选择并谙熟于心的。许多文人学者仍将文言文作为中国文学的唯一正宗形式。但近体诗、骚体等形式对句式、音韵等要求十分严格，以五言、七言为例，二者对押韵、字数和句数都有要求。这导致译文难以同时还原原诗的内容、句式和音律。

例如，拜伦的 *The Isles of Greece* 的译本有传统诗歌体和自由诗，下文节选了原诗的第一节和苏曼殊译文、闻一多译文进行对比。

原诗	苏译	闻译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巍巍西腊都，生长萨 福好。情文何斐亹， 荼福思灵保。征伐和 亲策，陵夷不自葆。 长夏尚滔滔，颓阳照 空岛。	希腊之群岛，希腊之 群岛！ 你们那儿莎浮唱过爱 情的歌， 那儿萌芽了武术和 文教， 突兴了菲芭，还崛起 了德罗！ 如今夏日还给你们镀 着金光， 恐怕什么都堕落了， 除却太阳？

苏译选用了许多熟悉的中国古诗意象，如“晨朝大点兵”令人联想到“可汗大点兵”，这样一来，虽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受五言诗篇幅的约束，缺失的原文内容和形式的不一使得原诗的魅力骤减。相较之下，闻一多自由体诗的容量能将人名、神话人物等内容和拜伦对希腊的热爱传达得更为完整。

随着自由诗在翻译中的运用，诗歌的翻译与创作不再是传统诗歌形式的特权，许多文人开始用白话文翻译诗歌并模仿自由诗体进行创作。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惠特曼的诗歌并深受其“自我本位”诗歌创作思想的影响。“郭沫若始终承认，惠特曼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张慧，2019：12）。下文将分析对比郭沫若译 *Song of Open Road* 的第一部分与他的新诗《天狗》的第一节，分析翻译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

《坦道行》	《天狗》
徒步开怀，我走在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 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者我， 任我要到何方去。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 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唏嘘，再不踌躇， 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 大道。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郭沫若的译诗《坦道行》，虽诗名仍为古诗的风格，但译诗时郭沫若并没有采用押韵、固定字数和句行，而是形随意动，按照惠特曼的诗意进行翻译，和原诗的形式几乎一致。《坦道行》描绘了“我”的所见：一条坦荡的大道上，“我”看到一个健全而自由的世界，“我”不会气馁，而是轻装前行。本节的后半部分，郭译还原原诗中的两个重复的“从今以后”，充分表达原诗积极乐观、奋勇向前的人生态度。在《天狗》中，郭沫若也采用了新诗的形式，用重复的“我”开头加上作者对宇宙万物的呼唤和气吞山河的气势，极力渲染了一个充满能量和魄力的“我”。几乎每一行都是长短不一，这与惠特曼自由体的特点非常相似，这一节的磅礴气势表现出郭沫若澎湃的激情。

（二）诗歌情绪的彰显方式

诗歌翻译让中国诗歌彰显情绪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第一，它让中国诗歌情绪的彰显更为直白。新诗受英诗形式和内容的影响，语言形式和情感的表达都更为多样化。例如，惠特曼的诗歌常用辽阔的景致如大海和陆地，来歌颂自由和民主，这一点与五四运动倡导科学、自由、民主和革新的精神相契合。惠特曼《草叶集》中彰显的“自我”，也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的作品。通过上文对比可以看出，在他的《天狗》中，“我”字充斥于每一行诗中，用排比句式形成了磅礴的气势，“我”充满了能量和跃跃欲试的雀跃和激动，想要推翻一切、革新一切。这是在惠特曼影响下郭沫若对五四运动的呼喊，表达了他呼吁个性解放、追求革新的愿望。

此外，一些感叹词和新标点符号进入新诗，让诗人的情感以更直接、简单的方式表露出来，更容易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随着国内学者对标点符号的革新，许多诗歌中出现感叹号、问号、破折号等外来标点符号。句号和感叹号在中国的使用，始于陈望道发表的论文《标点之革新》，该文对现代标点符号的确立和使用起到了推动作用。自由诗句式灵活的句式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体现了表情达意的优越性。外来标点符号为诗歌内容和情感的扩充起到了推动作用，配合口语词、感叹词的使用，让传统诗歌中诗人的内

敛情绪释放出来。譬如,郭沫若的《匪徒颂》中多次使用“呀!”来表达他对“学匪”一词的愤怒和对革命的渴求。《炉中煤》中多次深切的呼唤“啊,我年青的女郎!”来表达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和热爱。

(三) 诗歌内容、流派及题材的多样化

随着诗歌翻译的发展,新诗的内容也更为充盈。首先是引入了外来词,白话文兴起之前,书面语多以四字词为主,对外文诗歌的译介扩充了白话文的词汇,例如,郭沫若《天狗》中就有许多外来词汇,如“星球”“X射线”“电气”,甚至还直接使用了英文单词 energy,充分体现出新诗对外来词汇的接受程度之高。其次,新诗还开始引用国外的名人及典故。如《匪徒颂》中提到了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德国的马丁·路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国家为革新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伟人。这些引用充分表明国外作品、伟人的革命事迹对中国文人的触动和推动力。

诗歌翻译催生了许多新的诗歌题材,如爱情诗、湖畔诗等,内容包含自我抒发、哲理、爱情、平民的艰苦生活等。以郭沫若为例,在大量阅读惠特曼的诗歌后,他的诗激发出强烈的情感、激昂的韵律和“自我”的抒发。他的诗风奔放而热烈,用洒脱的文笔书写大海、晨风、辽阔大地等壮阔的自然景观,充满了对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向往。徐志摩的诗歌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翻译了不少哈代的诗歌,如 *I Look into My Glass*,并在翻译时十分注意音韵的美感。受翻译的影响,他的朦胧诗和爱情诗以清新悠扬的诗风和独特的韵律在新诗创作中独树一帜。随着新诗歌题材的层出,人们心中的固有观念也逐渐被打破。新诗在体裁、语言特征和句式韵律上各有自己的特点。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多个诗歌流派,题材和风格也呈现多样化。如新月派的诗歌呈现散文化倾向,并提出了新诗的“三美”主张,即新诗不宜过于松散,应具有一定格律。湖畔诗派则以爱情诗表达真挚热烈的情感和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叛逆。象征诗派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跳出逻辑思考,用充满暗示的意象引发读者进行联想。这些新的诗派,都表明诗歌翻译推动中国诗歌在内容上的创造和发展。许多诗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或表达真挚

的情感,或抒发自己的政见。

四、结语

“翻译是语言转换活动,而就其本质而言,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许钧,2002:222)。清末民初的文化翻译,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驱使下应运而生。翻译的主体多为当时中国各界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了解当时中国的落后之所在,不忍心看到盲目自信的国人将祖国进一步推向危险的边缘,希望通过译介西方各类文学作品开启民智。翻译的客体涉及政治、经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题材,题材之广,为中国三大翻译高潮之最。

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为本国诗歌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它在形式上让中国诗歌摆脱了传统模式,出现了自由诗、新格律诗等新形式,让诗歌情感的彰显更加多样化,且扩充了中国诗歌内容、题材和流派。这些革新让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为改变中国的社会道德文化观念、消除对本国文化的盲目自大做出了贡献,更多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此基础上,诗歌翻译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现代文学和语言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是翻译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为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使其永葆青春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2] 高梦涵. 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形象建构 [D].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 [3] 胡适. 《胡适文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谢天振. 中西翻译简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5] 许钧. 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 219-226.
- [6] 谭福民. 论郭沫若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 [J].

- 外语教学, 2013, 34 (5): 110-113.
- [7] 赵冰, 孙雪松. 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出版参考, 2015 (15): 46.
- [8] 张慧. 神形兼备的自由诗汉译——郭沫若汉译惠特曼自由诗研究 [J]. 散文百家, 2019 (9): 12-13.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

Gu Yi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Translation,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c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with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promotes China to usher in another climax of translation. 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brings the form of free verse into China, enriching the poetic forms of Chinese poetry. The use of repetition and exclamation marks makes the emotional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poetry more direct. The translation also enlarges the contents, themes and schools of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oetry translation; Language; Culture